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二期 ——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 z k 0 0 1 1 e ）

【自由论坛】纸上的博物馆	周泽雄
【不堪回首】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段历史	点 滴
再听绝唱——读赵丹的文革交代	李 辉
附：读李辉作《风雨中的雕像》	周泽雄
【史海钩沉】“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	何 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自由论坛】

纸上的博物馆

• 周泽雄 •

其实，“文革”博物馆建不建是无所谓的，如果这指的仅是一幢建筑物的话。虽然“文革”时期官方鼓励人们引用的大量警句，真正强有力、颠扑不破的看来只有这一句——但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臂戟指，说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现在官方已经不这么鼓励了，现在它希望我们牢固树立这样的认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前进。我是根据一条“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结合当局拒绝采纳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提议，猜出这个意思的。

如果我们民族还不具备直面过去的精神力量，建在地上的博物馆，与建在空中的楼阁，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何况，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未必需要官方的力量，甚至未必非得具有传统博物馆的形貌。我相信，参观古拉格群岛与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后者更能反映苏联大清洗的内幕，更能说明当权者的无道、人民的苦难和尊严，因而也更具有博物馆的内在本质。在了解历史真相的诸种途径中，读者的身份较之观光客的身份是毫不逊色的，文字的力量，从来不在具体实物之下。实物会损坏，语言则能传之久远。在苏联，当索尔仁尼琴们通过文字再现

了“古拉格群岛”之后，再建一个“古拉格博物馆”，也许反成了一项不急之务。灾难被铭记了，罪行被审判了，死难者再也不会被忘怀了，凶犯则永无越狱可能地被文字囚禁了。这是纸上的博物馆，来自民间，代表正义，直接与官方对峙。它启蒙而非乞怜官方的良心，教育而非求助当道者的智力，它以地火的方式运行，所到之处，民智为之开启，正义为之燎原，权奸为之战栗，它毫不介意地就把火烧到宫廷的台阶上。如果当道者执意扑灭它，那就烧破他的衣襟，照亮他的狰狞，焚毁他的宫廷。

回到中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文革”的受难者，才最有权力揭露它，控诉它，这个权力是由死难者赋予的，是由无辜者的鲜血加盖了朱红印章的，因而在法理上也是足以傲视任何人间权威的。如果区区个人不具备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经济力量，他可以在精神上修建它，比如以文字为建筑材料，以正义为布局思想，以良心为施工原则。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根本没必要请示领导，申请拨款。如果他做不到，和在上者无关；如果他做到了，同样和在上者无关。建还是建“文革”博物馆，只能代表官方的良心和趣味，他可以做，也不妨不做，只做他暂时认为更适合做的事情（比如“经济建设”，公正地说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何况，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并不必然地属于政府行为，将矛头对准政府，只能造成政府和民间的双重难堪，双重怯懦。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可不是在政府的授意下完成的，它甚至曾长期被禁止出版，它的作者甚至只能长期流亡海外。但是它建成了，一座秦火中的建筑，一俟完成，从此再没有任何秦火可以焚毁它。

“文革”过去二十多年了，不管有些精英先生如何抱怨民主进程的缓慢，我们仍得承认，中国已经朝着好的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她会越来越好。地上的“文革”博物馆虽然迟迟没能建立，但民间的渠道并未被封杀，纸上的“文革”博物馆，还是有机会建立起来的。球踢到了民间这一边，踢到了知识分子这一边。别去埋怨当道者的良心，拿出你自己的良心罢。试以巴金先生为例，众所周知他是“文革”博物馆的首倡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定程度上还是“文革”的参予者。面对“文革”，他除了应该拿起自己那枝据说其大如椽的巨笔进行控诉外，也可以展开自我忏悔，只要他觉得必要。他果然这么做了，一时誉声四起，声名震天。然而将他的扛鼎之作《随想录》放在《古拉格群岛》边上一比，立刻软弱得连只苍蝇都拍不死。这位“一知上意不喜此”建议，便同意在《巴金选集》中删去《“文革”博物馆》一文。文坛巨匠，事实证明也是“文革”博物馆的一名不够格的建设者。要知道上边固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却也没有剥夺他写作的权利，更没有禁止他的出版权。——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不错，要说真话。就算他自己做到了，这也不像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几乎所有的中国家长和幼儿园老师，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何况，一些负责任的人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他自己连这点也没做到，不仅当年没有做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到，因为他的真话居然还包括这条：“除了文革十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问题”。又何况，本人虽说德低望轻，却也没觉得说过什么问心有愧的谎话，犯不着听一个有前科的人对我进行教育。就像我想都没想过加入“法轮功”，又有什么义务接受退出“法轮功”的家伙在电视台上对我进行的教育。

~~~~~  
【不堪回首】

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段历史  
• 点 滴 •

CND文革博物馆收集的罗点点关于“郭沫若两个儿子”的文章中说：“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

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我与死刑号”一文中张郎郎说：“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可是，噩运并没有结束，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毒打。一天，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他妹妹前来收尸的时候，还没有松绑。

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

我今天写的是文革时郭世英自杀前后的一段历史。

我是六三年入学的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和郭世英一起上过大课，但是因为是一、二百人的课，我们都不认识他。文革中六七年，学生中的一些人开始当逍遥派，因为大家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运动变成了上头的权力之争，斗来斗去，争权夺利，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冬天来到时，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大家又拿起书本，或到农田果园去边学边实践。

可是，到了六八年春天，社会上开始批判臭老九（即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大学生。在大街上会有人盘问你是否是知识分子，假如你回答是，他们就会让你低头弯腰坐飞机，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在社会上掀起批判臭老九的时候，学校里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是冲着学生来的，复课闹革命又受到干扰。学校里进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农大的工宣队是北京市邮电系统的，我参加工作后回北京时，有一次在东四邮局还碰到一位师傅。我们对他们印象还好，因为他们还有点儿人情味，他们和同学住在一起，有点儿像四清似的，同吃、同住、同批判，有时候对军队过份的举动，他们也会不同意。但是军宣队是老大，有时工宣队说话都不管用。譬如，那时兴起了查户口，半夜三更军宣队就到宿舍来，检查是否有别处的人混进来。工宣队老李和我们班男同学住在一起，军宣队来检查时，他说：“这个屋子里没有别人，我可以证明。”但是军宣队还是要每个学生拿出学生证来，我们班的男同学不干了，和军宣队吵了起来，这一吵，了不得了，军宣队召开全班大会，让他们宿舍作检查，在军宣队眼里学生也成了专政对象。

对这些没什么问题的学生尚且如此，对家庭或个人有问题的就更是残酷斗争了。这次批判以班级为单位，目标是针对学生。当时提出查三代，包括家里成份不好，有父母或亲戚成了走资派的，或者家里有海外关系的都被批判，本人有过问题的就更难过关了。我们班还好，因为大家的成份都很高，全班45个人中，只有一位是烈士出身，所谓革命后代；一位中农出身的，文革初对大家横眉竖眼，这时她父亲因解放前做过县参议员，已不敢嚣张；另一位总爱炫耀自己是革命军人出身的同学，父亲因是国民党起义的军官，正在受批判，所以也无法整别人。大部份同学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或更高些，因此班里也没有人打人。

有的班就了不得了，极左的很。他们在班里打，在学校里批，全校到处都可以听见被打的人哭嚎的声音。我们在七号楼学习讨论，就听见六号楼农学系的贺飞被抽打的嚎叫声，我们一起上过大课，都认识，所以忿忿不平，后来当学生调宿舍时，我先生和几个同学在搬家时故意找岔儿，把打贺飞的学生打了一顿，虽然被军宣队批评，让他们在班里检查，他们心里还是挺高兴，觉得做了一件打抱不平的事。还有一个女生被打，告发的是她的好朋友，因为她想划清界限，但是却受到大家的鄙视。畜牧系林章育在七号楼前的斗鬼台上被批斗，原因是因为他说：“江青也穿

过连衣裙。”另外说他低级下流篡改样板戏。还有一个同学被批判是因为偷听古典音乐被告发，其实他是和我先生及另外两个好朋友一起偷听，我们班没事，他却好久没过关。有个小姑娘被斗，说她是“五·一六”分子，以死威胁她，她很厉害，豪不妥协，还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后来，不但打人、整人越来越玄。打人的又发明了熬鹰的方法整学生，24小时不让被斗的学生睡觉，他们认为熬不过了这些人就会交代问题。从那时起自杀风也就开始了。工会主席安铁志先从操场大烟囱顶上跳了下来，惨不忍睹。以后，除了老师、干部外，学生也开始自杀了。没有多久简直像得了传染病，自杀的越来越多，花样也不断翻新。

郭世英就是这时候自杀的。一天早上我们班早请示（早晨去毛主席像前背语录）回来，走到五号楼西边看见四个学生提着个麻袋，正向我们的方向跑来，到近处一看是个人，满身的血。回到宿舍，我正好有个化工学院的朋友来看我，前一天住在我这儿。郭世英跳楼时，她正站在窗前梳头，看到一个东西从对面六号楼二楼掉下来，到了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后来才知道是个人。以后我们就听说死者叫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大儿子，他被他们班同学毒打，熬鹰，实在受不了，就用反绑着的手拨开窗户的插销，跳窗户了，跳出来时头是向下的，所以才会摔死。后来他的尸体放在教学楼里老师站的讲台上。郭沫若曾亲自来学校看过，他的车就停在校医院和一号楼间，他提出要求验尸，以决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周总理也做了同样的指示，最后在学校验了尸才把尸体处理的。

以后，很多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自杀，但也有大难不死的。一个农学系的女生，父亲是彭真旧市委的，被批斗，她不怕别人怎么想，向他父亲了解真相，并且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平对待他父亲。她们班的女生罗力是个很凶狠的女孩，带头毒打她，说她要给她父亲翻案。她受不了就从我们住的五号楼五楼上跳了下来，谁知正好掉在楼前的珍珠梅灌木上，没摔死。也是早请示回来，我们看见她爬起来就冲着西边跑来，但跑了没几步，又摔倒了。三天后看到她，五官周围都是淤血。谁知道她没死成反而又被她们班的同学毒打，说她是假自杀，谁会从五楼上跳下来假自杀呢？

还有一个学生想尽办法自杀，摸电门，喝农药，跳河，上吊，怎么死都死不了，后来还是自杀成功了，但是我已忘了他怎么死的，当时被大家传为笑话。

我们毕业前经历的最后一一起自杀案是一位土化系的研究生。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告他，说他用手比画成八字形指向毛泽东的像，是要枪毙毛主席，把他当现行反革命批斗。这位研究生把自己吊在双人床头中间的栏杆上，但被人发现并及时抢救，救他的就是现在国务院对台办主任陈云林，他为他作了很长时间的人工呼吸才救活他。

总之当时北农大在北京市出了名，很短的时间内，前后共有36名自杀的，听说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 ∞ ∞ ∞ ∞ ∞ ∞ ∞ ∞ ∞

再听绝唱——读赵丹的文革交代

• 李 辉 •

几年前，黄宗英交给我一摞材料，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这令人感动的信任，顿时让我感到手中这些稿纸的份量。随后，一次又一次翻阅，一页又一页整理，一个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渐次在我面前铺展。

说来惭愧，在1978年初上大学之前，赵丹的电影只看过一部《林则徐》，而且还是在文革爆发前的童年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印象。

走进复旦大学，专业是文学，适逢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这才有机会陆续观看一些“内部电影”。记得那时，上海文艺界几乎每周都要放一两部“内部电影”，我们这批中文系的学生也就有幸一睹。说是“内部电影”，无非是当时不能公映的外国名片或者过去曾经受到过批判的中国电影。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了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才知道什么叫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后来，他主演的《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等相继重见天日，被掩埋的历史一页页翻开。久违的赵丹，终于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我没有想到，将近20年后，能够有机会翻阅赵丹的交代，听黄宗英讲述赵丹的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于是，在跨进新千年的热闹非凡的声浪中，我愿意以一种特殊心情来翻阅一个人的命运，再次倾听他的绝唱。

# ◇ 文革后的赵丹为什么未能重返银幕？

先从文革结束后赵丹最后的故事说起。

印象中，那时除了访问过一次日本外，赵丹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更没有机会重新走上银幕，扮演他梦寐以求的形像。黄宗英回忆，文革刚刚结束时，赵丹特别想演电影，可是，在文革中关押过多年的赵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启用：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

“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带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黄宗英回忆，方志纯当即以江西省委的名义，盛情邀请赵丹到江西指导南昌排演话剧《八一风暴》，并酝酿将该剧改编为电影。这是赵丹文革后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动。就在准备到江西去时，赵丹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赵丹出差需要单位开证明，上面写着：“赵丹去你处学习，请接待。”赵丹一看，发了火，说：“什么叫学习？我不去了。”我劝他去走动走动。在江西他非常高兴，方志纯把他当贵宾，还请他上了主席台。和在上海的处境相比，有天壤之别。（1997年11月8日与李辉的谈话）

重新出山拍摄电影，是赵丹文革后最大的愿望。黄宗英说：

他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他进入境界时最可爱。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么也顾不上。从大的方面到细节，都一一想到。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没有拍过电影了？记得大概在1977年吧，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好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来。我真担心他会发疯。已经粉碎“四人帮”了

啊！可关于赵丹的谣言满天飞。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长黄镇讲理说：“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其实撤赵丹也不是黄镇做得主的。赵丹被撤后，我赶紧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还要我给他写齐白石，还说要就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八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根据与李辉的谈话和信件整理。）

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 ◇ 文革中赵丹被捕，关押在他演革命者坐牢的监狱

何曾想到，赵丹这位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演员，却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过等原因，被关押起来。几年里，每天被迫做的事情，无非是反反复复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贬斥。他多么向往银幕，向往在一个个艺术形像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的艺术正在旺盛期，正是收获时节，可是他却不得不将生命消耗在一页页自我践踏的交代中。即便在30年后翻阅它们，我不能不感到痛切万分。

黄宗英向我讲述过赵丹1967年12月被捕的情况：

被捕的前几天，赵丹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们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还想上台！他们就是要破他的相。事后让他回到家里休息一个星期。大概就在1967年12月初，一天来吉普车把他抓走。当时我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白穆告诉我：赵丹被带走了。接着，造反派要我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从海燕厂走到湖南路，距离不近，我感觉不是走在地上。丈夫被捕了，眼睛还被打坏了，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和公安局有关系。（1997年11月8日与李辉的谈话）

据阿丹后来说，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过提篮桥时，他还是从蒙眼布的底缝中明白自己不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接着，车到一个地方停下，他听声音明白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往下走，往下走，当他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被解了眼罩，发现自己只有凭高高墙壁上的一线光，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他明白这是与盛世才监狱里一样的手段——先在精神上吓唬犯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最初关押他的是什么地方。他估计是当年日租界里日本人摧残政治要犯的死牢。（1998年10月写给李辉）

赵丹在这个至今不清楚的地方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三百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历史此刻在赵丹身上出现巧合。20年前的1948年，赵丹参加电影《丽人行》的拍摄，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剧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狱，那座监狱也就是现在赵丹被关押的地方。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黄宗英记得，当年她曾陪着赵丹的父亲，到现场看赵丹拍摄《丽人行》。他们看到赵丹扮演的胡子拉碴的剧中人，被国民党宪兵队押下车。20年后，赵丹又来到了这里。不过，此时，虚构的世界却成了他真实的生活。赵丹后来告诉她，他从

车上被推下来，一抬头就看到熟悉的地方，后来还听说上海市委的老干部有的也关在这里。他被关进囚室后，听到有人大叫：“我要去见毛主席！”他听出来了：这是贺绿汀的声音。

“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你是139号，139号就是你的名字。”一走进这里，赵丹就听到这样的命令。和所有被监禁过的人一样，赵丹也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就像胡风集团冤案发生后，入狱的绿原的代号是0686，路翎的代号是0684，贾植芳的代号是1042。而那时，赵丹曾发表过慷慨激昂的声讨文章《我的愤怒已到极点》。如今，他自己也面临惩罚。

几年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 ◇ 变相折磨的交代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便成了139号赵丹的主要任务。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广，从三十年代从影的经历，到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盛世才当局关押前后的情况、释放返回重庆的演出活动，以及文革前十七年里的文艺活动。关于后者的内容，赵丹被迫交代演出《武训传》《李时珍》等业已拍摄完成的影片，即便没有拍摄过仅仅有念头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赵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说是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捕入狱后，在盛世才当局的胁迫下做了叛徒。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一度采取亲近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先后派遣大批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新疆顿时吸引了不少左翼人士投奔。先期抵达那里的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茅盾、杜重远、张仲实等。1938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张仲实任副董事长。经邹韬奋的介绍，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与茅盾取得联系，他们也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但是，很快，盛世才在1940年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在其列。

孟驰北是当年与赵丹在新疆结识的朋友，他在回忆文章《赵丹在新疆》中这样记叙过赵丹在新疆监狱的生活：

赵丹最初被当作要犯关在特别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后来，移到第二监狱。次年，曾任过哈密县长的程方伯也被抓了。

赵丹在监狱里看了大量的苏联小说，他和程谈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也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绪烦闷的时候，轻轻哼唱高尔基的《囚徒歌》。

两年后，1942年，新疆局势突变，本已转向投奔蒋介石的盛世才，被蒋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宝座。据说，他是靠大量行贿才在重庆谋得一个闲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国民党当局，派审判团来乌鲁木齐处理积案。一部份中共人士仍然被关押。而其他人士只要有人担保，便一一释放。孟驰北回忆，赵丹、徐韬等人找到当时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永祥（八十年代担任新疆政协委员）担保，因为刘的妹妹曾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话剧演出活动。刘永祥当时还兼汉文化促进会的董事长，直接负责实验剧团，便出面为他们担保。这样，在盛世才监狱里被关押将近5年的赵丹，终于获得自由。

然而，在复杂的历史被绝对化、简单化的年代里，有过如此经历的赵丹，又如何能摆脱无休止的折磨呢？从入狱开始，一直到1971年，仅在黄宗英交给我的这部份交代中，就有好几次长篇历史交代，特别是关于新疆生活的。他不得不苦苦搜寻记忆，反反复复把同一件事、同一细节写出来。

# ◇ 避讳江青与自我作践

赵丹很聪明，他知道即便交代历史，与江青有关的事情却是一个字也不能写出来的。黄宗英记得，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干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只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他马上醒悟到其中奥妙。他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当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来抄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的。

当时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

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在那样的处境下，在那个年代里，与赵丹有着同样命运遭际的人，又有几人能摆脱这样的无奈与尴尬？

除了交代一些历史问题外，有时赵丹还因为随时发生的“错误”而被要求写出检讨。

一次，看守来查房，搜到了几张小字条。赵丹一见，十分紧张，便抢过来撕掉。据黄宗英说，其实那些纸条并没有写什么犯忌内容，而是赵丹在新疆坐牢时，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里学会了抓阄卜卦，上面无非写上“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借此来消磨时间和鼓励自己。现在，他一个人被关押，极度孤独寂寞而无聊之中，便重新玩起这无奈的“游戏”。然而，抢纸条、撕纸条，无疑被视为“不老实”的抵触行为。赵丹被勒令写出检讨：

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那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还有一次从赵丹那里发现了两枚一分钱的钢崩儿。有钱同样是不允许的。为此赵丹又只得写出关于两分钱的检讨：

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记不确切了。记得我初到此地购买东西时，确是找分币零钱的。记得当时因为天冷，我曾要求过此地的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热量，可工作人员不肯。而买东西改作只找糖、不找分币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这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是马马虎虎，所以不知怎么就遗留这两枚一分钱的硬币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内的。

在此认罪，并恳宽恕是幸！

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赵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就是以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消耗生命。

#### ◇ 曲折的谨慎的抗议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着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在一次检讨中他写道：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

另一次写道：

一个个都放出去了，唯独还关着我。为什么党对我就如此苛求？为什么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党的政策就照临不到我的身上呢？难道我和党真的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吗？难道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弄到末了，原来就是弄倒我一个人？！查出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罪魁祸首”？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黑线、黑纲领吗？果真如此，杀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请乞诛之！为革命的利益，这是太合算的事了！

.....

另有一次交代中，赵丹索性指责对他实行专政的人，要他事无巨细地反复交代历史，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做法，天真的他还在想讲道理：

我又进一步想：一个人几十年的事，难道就是要一件件一撙撙都记忆得清清楚楚，一丝也不能差错、遗漏才叫做彻底坦白吗？这样，反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

所谓“彻底”总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只要是自己的重大的罪行，已落实的，详尽地（尽可能的）交代了，这也是彻底坦白了，或基本上彻底坦白了，而也只有这种坦白，（关键性人物，抓关键性的问题）才是实质的彻底坦白，其它的那些枝枝节节，半大不小的（既不涉及党的组织路线，又不是党的机密），即使再多增加些，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最多也只是个人的当时的反动思想，或贪生怕死，所招致的过错与罪行罢了！（当然作为个人也是不能等闲视之，要认真对待检查的！）但终究也不能变易原有的性质。除非是真的还有比我现在已交代的更为严重更为重大的政治问题隐瞒着，然而这，我是决不糊涂的，自己干的，这类大事，当然是不

可能忘掉的。可这是绝无仅有的！

当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才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赵丹。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

◇ 对文革后给他的结论赵丹至死也没有签字

与黄宗英谈赵丹，我总感到自己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记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集中这一个话题进行了长谈。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这次我们主要谈赵丹这批交代材料保留下来的情况。

这批材料是文革后发还的。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上面写着“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说：“你们说哪句是错话，那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来人说：“已经是内部矛盾了，你就签了吧，将来使用起来，还是要查档案的……”

赵丹猛地一拍桌子：“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我会让他使用？”

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你们先拿回去，以后再说。”

来人说：“你要不签，别人怎么使用？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

事情弄僵了，赵丹补了一句：“我不是针对你们。复查政策应准确。我不是针对你们。”

他们走后，赵丹又嘀咕开了。他说：“我这样发脾气，他们还会整我。”晚上他老叹气，做噩梦，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是“犯小人”，担心不放过他。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是签了？”我劝他：“忘了它！找你再说。”“忘了它”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我们不是史学家、政治家，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和老百姓一样，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活下去。他说：“要是关在里面，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他老是这样，一下子发火，然后又会嘀咕。

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是在他去世之后。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说：“复查组重新讨论了，结论也重新写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他们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后来，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赵丹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像，够了。

小女儿看到了这些材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一生吗？”

过后我再也没有看，把它们包了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再拿出来看了一下，心里真难受。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就要他每天干这个。我很冷静地给袁鹰摘了几段滑稽的，像关于演刘少奇、二分钱的交代等，交《散文世界》发表。另外，还提供给写《赵丹传》的作者参考。所有人都说我应该写写这些，可是我要写就一定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赵丹的这批交代材料能够保留下来，是值得庆幸的，它们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们不仅仅能从不同角度补充人们对赵丹人生的了解，从那些历史细节回忆中，感受他的复杂心情。同时，它们更为文革研究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在那样的日子里，居然会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自我贬斥的形式。读它们，我相信人们会透过赵丹自己涂抹上的丑陋色彩，看到那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家在历史风云中的活跃身影。而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 ◇ 黄宗英的补充：赵丹在狱中的被打和精神折磨

1999年11月底我写好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距与黄宗英那次长谈已有两年整。我当即把初稿寄给黄宗英审校，很快她在12月6日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写得坦率而感人，是对这篇文章的最好补充：

我刚才让亦代看看《再》，他一页没看完，就说：“我不要看了！”凡是深知阿丹一生饱受的非人摧残，都不忍“戳心经”。

我把阿丹的“交代”给你时，心里也很嘀咕。当时（1980年冬）上海电影局运动复查组交回的两大捆材料上，盖着一张大纸，上书：予以销毁。发还给家属就是表示“不留档案”，由家属亲自销毁。我若仅是家属，当然会销毁吧。毕竟是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阿丹若活着，他会怎样对待这两大捆交代？！我想不出。请你设想阿丹在九天九地看了《再》，究竟会是什么表情？我心忐忑。虽然阿丹生前曾说：“我以后写回忆录，一定写真真实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决不拔高。……”

我当时为什么会留下呢？不会是想到“个人命运是折射历史的一面镜子”吧。我是想写赵丹，不是以传记形式。但1947年夏天以前，赵丹的实际生活我不了解，正像不了解冯亦代1993年冬以前一样。但我几度提笔几度病倒乃至被送进医院。

我跟你谈阿丹时，没谈到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可能因为受到“在国际法中，政治犯在狱中不可以严刑殴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后都散布的“把某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保护，免得被群众打死”的舆论的影响。我仿佛也没有看见哪篇狱中纪实说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才敢告诉我：

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某次打得鼻青脸肿，不能拉出去斗（让赵丹看出来），以后就不往脸上打。

据当时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道具组的吉（藉？）耿龙（他是烈士子弟）说，在上海康平路文化界的专案组，某次开会，王洪文说：“赵丹不适合公判枪毙，就让他关押中慢慢死去。”会后，吉耿龙“郎”了一声：“赵丹啥罪过要伊死？”次日，吉被捕，吉的舅舅耿可贵（上海人艺演员）在干校以“防扩散罪”被捕。文革后，吉在上艺揭发此事。公审四人帮时，要我揭发我们家被抄，我说在法律上不成立，我不知道是江青抄家。要揭发，就揭发王洪文的话，因为吉耿龙在揭发前，看

过专案组的记录。但此时，我让吉再看记录时，吉过两日回答我：“记录已经不在。”但“让他慢慢死去”，我总是可以对你李辉说吧。

当赵丹逝世之后，做尸体解剖后，有参加解剖的宋慕琳（外院医生，我的朋友，女，已死）某日对我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在精神上的折磨，典型的是后来。实在交来交代去没什么可写了，就叫赵丹倒着年份、月份、日子、钟点交代，从12月31日午夜12时往前交代。赵丹说他写了两天后，早上起来就摔跟斗，呕吐了。所以，他骂专案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赵丹骂得最利害的几页，已被从交代簿中撕去，缺页。

以上，我所以写下来，为的是我对自己所述负责。

我对序的具体意见，是在第二章开头。由黄说也好，由李概括也好，总之要点出他当时具体的生存环境。监狱和监狱不一样，干校和干校不一样，向阳湖的牛鬼放鸭子还能留影，这在上海办不到，岂非留变天帐！

以上意见先寄给你，其他具体的将在校样上提出。

回想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君却无言。时间又过20年。谁还能想起他的绝唱？哪里还能听见悠悠回声？20年，一切似乎都变得很快，让人认不出旧时模样。不少事情却又仿佛依然如故。人便在这样的生活中走着。

∞ ∞ ∞ ∞ ∞ ∞ ∞ ∞ ∞ ∞ ∞

附：读李辉作《风雨中的雕像》  
• 周泽雄 •

从研究巴金崭露头角的李辉先生，又继余秋雨之后在巴金父女旗下的国内王牌刊物《收获》上任专栏作家，自不难一举奠定其实力派中生代学者的地位。李辉的工作方式似乎是这样的：出于对“文革”的强烈关注，对历史的崇高责任，他选择了陪历史老人（或历史老人遗孀）谈心的方式介入“文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角度，通过对当事者的采访，他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现场。如果材料真实，剪裁有力，叙述严谨，分析深刻，他至少有可能为我们在纸上重建“文革”博物馆的某个分支。该书没有序跋，我们无从了解作者的种种题外话。但寥寥百余字的“内容简介”，好像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期待。全文如下：“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叙了11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邓拓、吴晗、田汉、老舍、胡风、冯雪峰、赵树理、萧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醒”。（按：末字写错了，应为“发人深省”，另外“富有”也下得轻佻了些，说“具有”就可以了）。扉页上的题记更是“动人心魄”，让人不禁联想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入口处。格式如下：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

然而，读完全书后再以自己的印象加以对照，我可说作品没能兑现“简介”中

承诺的内容，更遑论“作者题记”中承诺的情感了。“凝重”的笔触无从捕获，“深刻”或“别具只眼的议论”难得一现，“鲜为人知的史实”虽有，却大半淹没在不加节制的“深长的感叹”中。可以说，我翻开书卷正是“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阖上它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作者掌握的史实，用以抒发情感，舞文弄墨，固是不虞匮乏，用以揭露真相，创建“纸上的博物馆”，则远远不够。何况，有些“史实”的功能还主要是情趣性的，展览性的，它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作者作为一介文士的个人趣味，而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古拉格群岛》的读者会轻易地发现，李辉为了描写一个人搜集的材料，我们在《古拉格群岛》近两千页篇幅中任选一页，都比它来得丰富和沉重。

我知道用索尔仁尼琴的标准拷问李辉先生，可能是不公平的，正如我们不该用托尔斯泰的标准责备老舍。这是由我们民族自先秦轴心时代以降长期奉行奴性教育这一事实所先验决定的，我们民族的思维机体里缺乏锻造自由精神所必需的条件，身心两方面均不具备抵受思想高温的内在素质。我也知道国内《古拉格群岛》的读者非常有限，这将使他们视我的比较为多余和苛刻。但是，两者处理的题材是完全相似的，两者面对的人类遭遇和集体命运是共通的。索尔仁尼琴就不惮于在作品中比较一下中国的“文革”，正是他提醒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在面对那些永远从大地上消失的冤魂时，对死者的敬重已无法使人顾虑其余，我不能过多地站在为李辉辩护的立场上，从道义上我也更应该从胡风、老舍、邓拓等长逝者的立场上进行考虑。因为，一旦打开他的书，我们的目标就是共同的。在这里，尽可能充份地写出那个时代的邪恶特征，将是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读者的惟一企求。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李辉掌握更多的材料，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如果“深刻”与否取决于个人的学养造化，但态度上至少应该更冷静一些，笔墨也必须更庄重一些。

作者的学识功力，远在他笔下大多数人物之下，至少远在邓拓、老舍、胡风之下。作者希望自己最终能理解他们是一回事，对自己理解力实际上非常有限这一事实不断持警惕态度又是一回事。这没什么丢脸的，即使让弗洛伊德来解释邓拓、老舍自杀前的心理，估计他也会百般慎重，压低着嗓门说话，尽量付诸探讨的口吻，决不敢轻易断言自己寥寥数语的判词已成不刊之论。然而李辉是豪迈的，他习惯于在自己的例子还没有产生足够说服力之前，抢先宣布结论。在该书中，我们不断听到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向读者担保：“这就是邓拓”，“这便是邓拓政治家的本色”，“这便是生活中的冯雪峰”，“他（萧乾）就是这样一个人”，与此同时读者却觉得还完全没到时候。在传主面临重要的人生转折、急剧的情感跌宕之时，作者不是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地试图凑近他，细看他，尽可能争取理解他，而是在粗率地引述了几封书信、交代了几桩轶事后，匆忙下出结论，或将主人公如此一言难尽的心路历程，用自以为法力无边的粗暴句式简单归纳。常用的如：“可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胡风”，“然而，这绝非邓拓毕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希望的。”“拥有这样的性格，他（冯雪峰）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思想区域内，保持独立思考的个性，不甘平庸，不甘麻木。”对结论的兴趣，使他对微妙的过程、具有说服力的细节常常显得不耐烦，习惯于一跳而过。他甚至忘记了，在这种性质的作品中，结论未必是必要的，未必是必然要由作者负责提供的，它更应该自然地隐含在事件的展开过程中，隐含在对细节准确、冷静、客观的描述之中。读者要求的是：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而不是把你感受到、联想到的告诉我们。当然，如果有真知灼见，说一说感受也无妨，但不宜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使叙述的沉静风格受到损害，使历史本身的凝重沦为轻滑文笔的牺牲品。作者曾在文中见缝插针地补充道：“我们没有他们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站立在岸边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冷静。我们是根据业已发生的历史来做出判断，种种历史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却有可能被忽略不计。某种程度上，置身于外的人，或许永远也走不进历史深处。”既然有此一贴清醒，笔墨中不时流露出的言语道断，自信神色，又所为何来呢？

作者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担心，用滞重的笔，描述那么一些显得沉闷显得枯燥的往事，对于读者会不会是一种阅读的折磨？可是，一次次，我又不得不无奈地这样做。”我要说，你多虑了。坊间尽有缺骨少筋的读物，怕受折磨的读者见了你扉页上的题词就会吓得作鸟兽散，你没必要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市场大得很。你要考虑的是那些勇敢的读者，他们在购买前多半已经具备尼采所谓的“一口好牙和一个坚强的胃”，他们做好了充份的思想准备，他们读你的书压根就没想过找乐子，他们走进追悼会现场可没打算听点轻音乐，他们打开书籍前会挺起胸膛，然后自言自语道：我准备好了，来罢。他们怀着对历史的真诚、对“文革”的关注、对生命的敬重、对未来的责任而来，你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无愧他们的期待，而不是像一位殡仪馆的化妆师那样，对死者来点修饰，涂点口红，惟恐把读者给吓坏了。坏就坏在你有这样一个“担心”上，于是，在你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过多的曾经流行在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笔下的“抒情插笔”，这边来点音乐，那边放朵小花，与死者的庄严、历史的沉重完全不般配的种种笔墨纷纭而至。结果，怕受折磨的人已预先逃离，准备接受折磨的读者，反而受到了完全相反的折磨。说句实话，读他的大作时，所有那些“深长的感叹”我基本上都是高速掠过的（它们至少占了一半篇幅），而读《古拉格群岛》时，我可像个校对员那样，不敢怠慢一个字。两相对照，我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文革”与苏联的灾难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就像索尔仁尼琴认为沙皇的监狱与斯大林的监狱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一样。（“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来探监”，“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察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但这个感受严格地说是该产生的，中国“文革”的当道者只是比斯大林稍少一点屠杀的兴味而已。作者的殡仪馆化妆师角色还体现在对死者的过份宽容上。一死可以捐万恶吗？不，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历史，我们谈论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不应忘却”，准乎此，对这些“文革”的受害者多多少少还曾是“文革”的参与者、鼓噪者甚至迫害者这一事实，就仍有必要秉笔直书。存在于这些优秀人士体内的精神蒙昧（老舍、邓拓、赵树理、胡风，都有程度不同的蒙昧乃至思想的罪愆），更不宜搁置不提。全民族精神层面的极大蒙昧，私意以为正是“文革”得以有效发动的最大基石。谈论它，即使内心充满同情，充满苦痛，充满不忍之心，仍然坚持谈论它，才是真正负责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文革”和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良莠并陈，优劣混交的，这既体现在卢宾卡监狱、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秦城监狱、民间牛棚会同时关押刽子手和被迫害者这一事实之中，也体现在每一个被迫害者体内同时具有清醒和蒙昧这一双重心智的事实之中，而且通常情况下，似乎还是蒙昧的成份多，清醒的成份寡。

李辉令我不快的，还有他在面对传主时，始终洋溢着旺盛的自我造型渴望。这也许是他刻意追求的风格，但在我看来，作品中的作者形像有“搭卖”嫌疑。如果说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大量自我造型还具备文体上的必然性，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张扬人间正义，揭示个体命运的《风雨中的雕像》，则应在最大程度上拒绝让自我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登场。书贵有我，但此处的“我”恰恰应不动声色地隐约在对传主的忠实再现上。好像一位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学家，他在面对刚刚出土的陶制战士时，必须加倍小心，屏气凝神，以便剔除多余的附着物，使那尊真实的雕塑得到完全重现。他的“我”，正体现在这份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之中，他可不能边干活边哼着小调。事实上只有在他以这种态度工作时，他作为“我”的价值才反而能够突出显现。在李辉《风雨中的雕像》里，所谓“深长的感叹”，相当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我登场。由于对自己的白描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对自己徒手在风雨中塑造雕像这件工作的艰巨性缺乏了解，由于他一面担心自己的笔墨“对于读者会不会是一种阅读的折磨？”一面自己又率先承受不了这份折磨，遂在“因共鸣而动情，因动情而笔墨酣畅”的借口下，转而搁下传主，回归自我，搁下历史，回归当代，在无关痛痒的领域大肆地“笔墨酣畅”起来。他喜欢向你谈谈自己与

邓拓在工作上的缘份，他“没有去了解胡风与路翎重逢的情景”，因为那个“一定是令人揪心的瞬间”，我们的作者是“不难想象”的，他相信自己只要“冷酷无情”地驰骋一番想象，或者读读绿原翻译的里尔克名诗《豹》，就能说出那个“遗憾”，就能煞有介事地写出下面这番宏论：“这是我‘沧桑看云’时不断浮现于眼前的景象。不能不面对它们，不能不描述它们，同时，又不能不为之惋惜为之慨叹。人们是否仍然走不出昔日的阴影，同样的景象是否会再现？人们是否还需要思想之外、文学之外的东西来获得刺激和亢奋？新的对象是否又会被选定，然后以此为焦点不同的人重又汇聚在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耗生命？”大哉宏论！难道出现得不是太早了些吗？难道它真能取代那些因为作者“没有去了解”而遭忽视的历史“情景”？他写得太多，说得太多，他不知道在这个场合，冷漠地描述细节，记录真相，其力量远在纵横捭阖的议论之上。你可以“因共鸣而动情”，却没有权力“因动情而笔墨酣畅”。这里需要的是节制，是冷静，外科大夫似的节制和冷静。

看来，除了作者的思辨能力和文学能力（主要是白描能力）明显不够外，更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精神结构承担不了情感模式的重压。一切都缘此而来。作者过于多愁善感，这一在诗人行里颇可称道的天性，在历史家的领域恰恰是多余的，坏事的。他相对脆弱的神经被历史惨怛的真相弄得崩裂了，变形了，在文字应该以无声的方式运行的时候，我们经常意外地听到作者那与事实相比永远显得多余、浅白的“言情派”表达。当我们不再感到意外的时候，作品的感染力也已大打了折扣。这是文风问题吗？不完全是。虽然作者太过喜欢煽情，但不客气地说，他的煽情能力本没有大到不可割爱的程度，他本该精打细算，节制点用才是。这是技巧问题吗？看来也不是。我认为这是精神结构上的缺陷，理性力量的不足，言情文字的泛滥，白描手法的阙如，只不过是该种缺陷的外在体现。由于对史实力量缺乏基本的尊重，遂误以为自己“深长的感叹”可以补叙述苍白之不足。这是锦绣文士的招法，这类招法用以写文人轶事，市井掌故，固然非常称手，用以表现巨大、深重如“文革”的人间浩劫，说轻点也是非常不谐调。《书屋》的读者都知道李南央的名字，因为他们读过她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两者对照，我们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之所在。

本文当然不是对李辉的指责，不，所有从事纸上“文革”博物馆建设的人员，都会赢得我发自肺腑的尊重。但鉴于“文革”是全民族共同的灾难，反思“文革”是全民族共同的母题，责任太过重大，使命太过艰巨，我们难免也会得寸进尺地要求建设者做得更好一些。这不是我作为一介读者的苛求，而本应成为我们和作者共同分担的责任。另外，李辉大作中显示出的文风问题、技巧问题（我说过，实际上是精神结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的“文革”题材作品中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严峻的历史困境是：中国有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却迟迟没有纸上的《古拉格群岛》，这与其说是当局的失职，还不如说是人民自身的失职。本人不便向当局进言建设“文革”博物馆，我只向作家和所有能拿起笔来记录“文革”的人冒昧献计。你们首先要神经坚强，对这份坚强永远只能持怀疑态度，而一次也不该误以为自己已经过份坚强了。在这里，记忆比想象力更为重要，在忠实面前，所有的修辞手法都得让路，除非它们能保证对历史的绝对臣服。情感是需要的，但不该凌驾于事实之上。压抑、沉闷乃至苦痛、绝望的笔墨是不必回避的，既然那曾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写罢，以你坚强的神经进行写作，如果一时找不到别的风格，那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写，像加缪写《鼠疫》那样写，但请别再像李辉那样写。

风雨中的雕像，应该能在风雨中历千年而不坏。

~~~~~

【史海钩沉】

“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

• 何 蜀 •

武斗历来与政治性群众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中的武斗，则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大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均有武斗发生，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局面，与“打倒一切”并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特征。近年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中，较多注重于“打倒一切”的研究，而对“全面内战”的研究则很不够，因而出现一些误断。例如，不少权威性的“文革”史著作都一致把上海康平路事件（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以武力打击工人赤卫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认定为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如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中说：“这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1〕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说（康平路事件）“在全国开大规模武斗的先例。”〔2〕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3〕

在这类著述中，只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到康平路事件时说法不同，称之为“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4〕，表现出对这一评价的审慎态度。

事实是，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30日，而在将近一个月之前的12月4日，在重庆就发生了规模更大、影响更恶劣的群众性武斗事件——“一二·四”事件。

◇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的背景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职务；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一个市委第一书记遭到公开点名批判：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与彭真被公开点名批判不同的是，任白戈是还在任上并且其所在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点名批判的。

虽然这次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被“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毕竟非同小可。重庆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17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但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也遭到“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自

身难保，哪还保得了任白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被迫在重庆市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了将任白戈“罢官”的决定。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执政党的首脑人物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形势怎不陷入空前的混乱？

自1966年8月中下旬以来，重庆群众便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而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派即当时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加上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时的许多做法及舆论导向使他们误认为这是又一场类似于反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

8月28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份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市、区党政领导认为这是右派学生闹事，便发动群众向造反派反击，在全市大造舆论，揪斗、批判八一五派学生和同情他们的群众，试图以高压来维持稳定，但是却不仅激化了两派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立情绪，而且在反击中因沿袭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的一些习惯作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将这个小冲突夸张宣传为所谓“暴徒逞凶”的“八·二八惨案”，结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谣”的把柄，反而大失人心，使不少群众转而同情、支持造反派。

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以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对待这场运动的，认为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匈牙利事件”、“右派翻天”，到一定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必然会号召反击，依靠工农兵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乱工厂生产秩序，影响生产。在9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提议，可以仿照革命历史上的传统工人组织，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搞好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先试点。重庆市委部署给工交、兵工、基建三个政治部，并在中梁山煤矿试点，工交政治部发了试点经验介绍。这样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到1966年9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中共组织和各地各单位公安保卫部门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纠察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在作为首家试点单位的重庆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于1966年9月5日发出的《宣言》中，就通篇没有当时已比较时髦的“造反”二字。可见其反对“造反”态度之鲜明。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类社论，反而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造反派、贬斥“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文章。工人纠察队的言行处处与中央精神不合拍，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

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工人纠察队陷入了困境。

◇ 冲突在密锣紧鼓声中酝酿

11月28日，重庆城内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到处张贴出了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海报》。

在当时，有关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工人纠察队总部更改的名称。面对滚滚而来的造反浪潮，工人纠察队已经军心动摇。为了稳住阵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更新组织名称，重整旗鼓，以利再战。（据笔者记忆，当时周恩来在一个谈工矿企业文革运动的讲话中建议工人建立文革群众组织时不要使用历史上有革命传统的工人纠察队这类名称，目前未找到此讲话原文。重庆工人纠察队是否因此更名？存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到群众集会上去造反，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行为。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可纠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抢夺广播话筒，发表造反声明，使你这个会开不下去……而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导致群众间的冲突。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十分担忧。11月30日在潘家坪，12月1日在小温泉召开的干部会上，市委领导就谈到一定要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12月2日上午，市委两位领导人在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约见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负责人，劝告他们，目前少数派（造反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12月4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是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只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当天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12月4日的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战斗军负责人的劝告一样不起作用。原本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一二·四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招来造反派的嗤笑？广大工人纠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12月3日白天和夜晚，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仍多次劝说工人战斗军负责人不开大会，结果无效。

就在中共重庆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一二·四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

12月3日上午，离大会还有一天时间，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纠”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温良恭俭让”，太“右”了。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头头又制定了另外两套强行冲击会场

的造反方案，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

眼看一场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专程去到重庆大学，向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到“一二·四大会”上去。但是对于坚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来说，这些劝告自然是毫无作用的。武斗之势已如箭在弦上。

◇ 万人大武斗与“尸体展览”

12月4日是星期日。天刚亮，人们便已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体育场。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学校教职工组织）、文艺兵（文艺界职工组织）等，当时这些组织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准备。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了工人纠察队写的标语“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与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不同，“工纠”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以示“大民主”。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照例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还一本正经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过参加大会、“支持革命工人运动”事宜，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自然也礼貌地表示了欢迎。因此，尽管大会组织者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让造反派的一些组织挤进了会场。

在双方都箭拔弩张、摩拳擦掌的气氛里，大会终于开始了。

大会刚刚开始，发言尚未进行，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这次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辩论，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个不成文规矩，若是“出身不好”，马上便会被轰下台去。但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血统论已开始受到批判（主要是因血统论的鼓吹者谭立夫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力保老干部而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造反派大多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抓到一个借口就行了。

先期进入会场的造反派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拼命向主席台冲击。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闻知场内已经起事，便也奋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场内发起冲击。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率先爬上主席台的重大八一五两个头头要抢夺话筒发言，被早有准备的大会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一个冲上了台的首都红卫兵曾一度抢过了广播话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但仍被抓走。台下的两派群众，也从起初的推挤、谩骂发展成扭打，旗杆、标语牌等都被当成了斗殴的武器。双方还出动了上百的摄影师，站在汽车、宣传车顶上和主席台、看台的高处，抢拍各自所需的镜头。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带领工人纠察队一派群众高呼“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

红小兵（小学生）们，也在老师带领下紧张地挤在一起，胀红着小脸拼命用稚气的声音加入这个狂热的大合唱……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中共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冲突发生后，被派到会场观察的文革办公室干部一方面竭力劝说双方停止斗殴，一方面打电话向市委反映。市委当即派了一位书记处书记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

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两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会场外的武斗却又蔓延开了。两派群众都被“惨案”所激怒，或出于报复，或为了抓“凶手”，掀起了打、砸、抢、抄、抓的狂潮。局面完全失控，中共重庆市委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早有准备的造反派立即大造舆论，称之为走资派一手制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惨案”，并断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当天下午，造反派就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第二天又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会上说：“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千、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被红卫兵小将们视为“革命前辈”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也在会上发言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所谓“目击者”的揭发、控诉也大量出现在传单、小报和大字报上。

正如当初反对造反的一方力图以“八·二八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造反派一样，此时造反派也力图以“一二·四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保守派，并进而搞垮市委。于是，造反派便一心要证实“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到处搜寻证据。有人传出了“市委要毁尸灭迹”的谣言，造反派便马上派人到市郊石桥铺火葬场去将正待火化的14具尸体“查封”。一些造反组织还在交通要道口设下检查站，检查是否有人转移尸体。

“死人”问题一时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300人，大部份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才来参加调查的，但是查来查去，却一无所获。

在相互攻讦中，工人战斗军一方发现造反派在“死人”问题上陷入了窘境，便抓住死人问题展开反击，强烈要求市委公布“死者”姓名和单位，使造反派更加被动。

这时，一批“敢字当头”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外地驻渝红卫兵一起，采取了一个在造反派内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对的极端作法：于12月6日下午从火葬场强行抢走了四具尸体，连同当晚从一家医院抢出的一具尸体（死者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红卫兵）一起，作为“可疑尸体”，从7日下午开始在体育场展出。

“尸体展览”一经开始，造反派的宣传口径就很快变调，“可疑尸体”变成了“受难者”，进而变成了造反“烈士”。在不到两天的展出中，估计有数万人前去

观看，不少造反组织还送去了花圈、祭品。在重庆全市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扩大影响，文艺界造反派还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深厚的阶级感情”迅速创作出悼念“一二·四死难烈士”的悲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中深情唱道：“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一时间，重庆街头到处挂起了抄成大字报的歌单，有人站在桌凳上义务教唱，学唱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其热情投入远胜过当今之卡拉OK爱好者。这首歌迅速传唱开去，成为搞臭“工纠”，批倒市委的有力武器。

因造反派内部分歧，体育场的尸体展览草草结束，一些造反派又将五具尸体强行抬进中共重庆市委院内，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屋里，陈放于办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进行要挟。要市委交出所谓“黑材料”。后来通过一些红卫兵出面作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将尸体抬走。

这五具尸体，经造反派最终也认定不是他们所说的“烈士”。但有的造反派仍不甘心，对那个死于心脏病的八一五派红卫兵的亲属进行劝说，启发“路线斗争觉悟”，鼓动其当“烈属”，但未能得逞。

◇ 重庆“一二·四事件”对全国的影响

“一二·四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早已将舆论造向了全国——在那天同重庆造反派一起冲会场的就有首都三司、首都一司、四川大学八二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及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等外地红卫兵。各地造反派见到传单，认为有利于搞垮“保守派”，也不问青红皂白，纷纷加以翻印、转抄。

1966年12月17日，重庆造反派有关“一二·四惨案”的宣传造成了最大的影响。这天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重庆造反派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也参加了大会。因为首都三司红卫兵直接参加了“一二·四大会”上的造反行动，又参加了事后的“联合调查团”和“赴京控诉团”工作，还有的三司红卫兵以“目击者”身份发表过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事件”在全国同类事件中的份量。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分别发言。在发言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发言者除去几个首都红卫兵外，只有一个外地代表——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的代表，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罗广斌的造反原因十分复杂，他不久即被打成“叛徒”、“政治扒手”，被迫害至死）。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重庆代表的发言却是“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并声称在这次血案中革命群众

被打死了人，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发言中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有关重庆“一二·四惨案”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传。

在这样一个有当时几乎所有常在公众集会上露面的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派”的大会上控诉“一二·四惨案”，重庆造反派的发言代表又是一位当时声望正高的“革命作家”，这就使得重庆“一二·四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在大会当天，重庆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的赴京告状团驻地便被首都造反派查抄，人员被赶走。报导这次全国造反派集会的《首都红卫兵》报和大会发言录音被迅速带回重庆，广为传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以积毁成山之势沉重地压到工人战斗军等群众组织头上。造反派以“抓凶手”、“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到处抓人，私设公堂和监狱，不仅报了“八·二八”之仇，而且为造反派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下一步的夺权赢得了条件。

◇ 对重庆与上海两次武斗事件的比较

对重庆“一二·四事件”与上海康平路事件，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比较：

1.时间：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而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于同年12月30日，比重庆晚将近一个月。

2.规模：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在十多万人集会的体育场，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在两万多人静坐的街道上。

3.受伤人数：重庆“一二·四”事件受伤人数，据造反派的调查组公布的数字，最初为200余人，后来为405人。上海康平路事件，仍据造反派的统计（《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是100多人（5）。

4.对全国的影响：如前所述，重庆“一二·四事件”发生后，不但由外地驻渝红卫兵迅速向全国造出了舆论，而且还在北京的全国性集会上制造了影响。而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已是1967年1月，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将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夺权。上海工总司在康平路事件后也未像重庆造反派那样围绕“惨案”大造舆论，而是很快（1月5日后）便转入了所谓“反对经济主义”的新攻势。特别是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文件”（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的《紧急通告》）得到毛泽东肯定后，对“两个文件”的宣传更是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上海康平路事件在当时并未造成像重庆“一二·四事件”那样的轰动效应。

全面考察当时的全国局势，在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之前，群众性武斗事件在一些大城市已多有发生，只是规模及影响都不如重庆“一二·四事件”。张春桥是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次全国造反派集会的，他亲自听到了对重庆“一二·四事件”的控诉，当然十分清楚这一事件的影响和给造反派带来的好处。在他后来策动和挑起上海康平路事件时，重庆“一二·四事件”等已经发生过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对他不会没有启发。

在一些“文化大革命”史论著中，上海康平路事件被提高到了大规模武斗的“全国第一次”、“开了先例”的地位，恐怕主要是因为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张春桥、参与指挥者王洪文后来进入了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并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而使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也得以随之提高。然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1) 《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70页
- (2)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285页
- (3)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31页
- (4) 《“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7页
- (5) 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康平路事件》，《上海法制报》1986年6月16日第3版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